那个从小就爱在作业本上涂抹“翅膀”和“小鸟”的白冰,把他的梦想化为字里行间的温情与爱意,小心翼翼地,弯腰递给小读者。

作家白冰

■本报记者 陈香

白冰:儿童文学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,现任接力出版社总编辑。1977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,代表作品有儿童诗集《飞翔的童心》、作品集《绿太阳和红月亮》等,译作有美国童话集《魔语》《丢了鼻子的小丑》等。作品曾获中国政府出版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等。

多年以前,那个在放学的时候,背着书包,看着彩云静静不动的少年白冰,可能想不到,他酝酿于此间的一首《写给云》会被广为传诵,被选进上海的中学生教材里,让万千孩子一起分享他少时的美好记忆;

那个刚刚踏进小学校门,总爱在作业纸上划拉着“翅膀”和“小鸟”的童年白冰,可能也没有想到,世事变迁数十年,他在诗歌和文字间找到了他所期冀的、“翅膀”和“小鸟”所象征的自由;

而那个爱在一棵最大的老榆树下听邻居老奶奶讲魔怪故事,“吓的要命”,爱上山去放风筝,下到河里捉鱼,爱玩泥巴,会和小朋友演皮影,至今还记得“那种变幻的感觉”的小白冰,可能也不会预料到,这种童年时期无拘无束的快乐,那种生命最初的最纯真美好的记忆,会让他不断回望,成为他深埋心中的灵魂故乡,成为他一生执着的志业。

没错,我说的正是白冰。他见诸报端的身份经常是“出版家”,然而,他的心魂所系,是让他时常可以重新体味纯净的快乐,无拘的生命状态的儿童文学。从上世纪70年代的中学时代就开始进行儿童文学创作的白冰,他最初和最执着的身份,其实是儿童文学作家。然而,尽管连连捧出了儿童诗集《飞翔的童心》、作品集《绿太阳和红月亮》、童话集《吃黑夜的大象》、低幼童话《狐狸鸟》等代表作,获得了中国政府出版奖、全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多项儿童文学大奖,儿童诗《假如》等多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,他在出版领域的成绩却遮盖了他在创作领域的成果,作为出版家的白冰时常掩盖了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白冰。

“稀里哗啦”引出作家白冰

这确乎是一种遗憾。今年,白冰创作的一套天真盎然的低幼童话“小老鼠稀里哗啦”系列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,白冰又以“作家”的身份出现在评论界、创作界和市场的视野中。

白冰对自己的作品一向谨慎和认真,“小老鼠稀里哗啦”系列,构思一年多、写作和修改一年多、出版过程接近两年,所以,“一个作品从创意构思到出版,周期是比较长的。”白冰感叹。这一瞬间,他似乎重回了出版人的角色。

“小老鼠稀里哗啦”系列写活了一对阳光、可爱的小鼠姐弟,小老鼠养星星,小老鼠刷房子,尤其是用小象灰灰的长鼻子来做发射塔,充满童真和想象的细节让人忍俊不禁。“我相信白冰写作的时候内心充满着欢乐,嘴角也一定浮现出微笑,他的笔尖划动在稿纸上时,会有音乐的节奏、阳光的闪烁。”文友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评说。

新作的灵感和触发点其实也是来源于生活。白冰去幼儿园的时候,或者和邻居的孩子一起玩、一起聊天,和员工的孩子聊天的时候,孩子的一些小故事从细节启发了白冰,“不写很难受”。

对于白冰而言,动笔的前提首先是细节,细节慢慢发展成了有生命力的形象,产生形象后,故事自然而然展开了,而“不是先有一个故事等在那,故事是慢慢走出来的”。

实际上,每一个幼儿文学形象,构思者都有自己思想方面的寄寓。“我想塑造两个鲜活的现代幼儿形象,他们快乐、聪明、阳光,从来不为生活中让人沮丧的事情破坏美好的心灵和心情,永远乐观豁达,微笑着面对所有的生活。我想,这可能是一代独生子女最缺少的品质。”

当然,写的时候,完全是两个小老鼠的形象牵着白冰的笔走,白冰并没有想给故事赋予这么多,但写完之后,他发现,原来自己寄寓了这么多。

选择儿童文学

走上写作道路,似乎也是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。

“自己喜欢看书,看书的过程当中就有了想写的欲望,试着写了些诗歌、散文、童话,儿童故事。16岁的时候,河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会组织省里的业余作者开改稿会,我因为写了一些稿子,就经常参加这样的改稿会。还有,我们县文化馆发行的刊物《平泉文艺》也发表了我的一些作品,慢慢就走上了写作道路。”白冰还记得,他开始是写一些诗,后来写儿童故事,收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的儿童文学作品集子里边。

至今,白冰还记得,“那时候,对我帮助非常大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文艺室主任聪聪”。聪聪告诉白冰应该多读书,多练笔,生活上、事业上要有追求,这样的勉励时常回响在小白冰的心中。

当时,白冰上学的时候,正是文革末期,无书可读,很多名作经典被封存,作为“毒草”锁在学校院内的一个天主教堂里,爱读书的白冰和同学冒着风险,悄悄地偷出一些书来阅读。尽管如此,还是常常会面临无书可读的困窘。当时,同学之间会悄悄交换一些所谓的“封资修”的书看。“我姐姐爱看书,她从同学那借书,但是同学间是有规定的,比如,三天看完,再传给下一个同学,不然就取消下一次借书的权利。有时候我姐姐两天看完,剩下的一天,我无论如何都看不完,也抄不完。”白冰说他至今都能回忆起那种痛彻心扉的失望的感受,而对知识与文化的渴慕与追求的根,此时已深深扎下。

“实际上,还是阅读引领了我的人生道路。”白冰回忆说。

那时候的白冰读泰戈尔,读托尔斯泰,读普希金,读俄罗斯童话,读阿尔巴尼亚的短篇小说,读鲁迅,喜爱金波的诗集《回声》,“对儿童文学、对诗歌的喜爱就是这时候种下的”。

很多时候,白冰常常回想,为什么将儿童文学作为自己一生的志业。“我觉得,我骨子里很‘儿童’。”“很简单,对事情执着,为人简单,做事简单,而且喜欢把生活、把人都看得很美好。”白冰说,自己就是这样的人,恪守的,是“认真做事,真诚做人”的人生信条。

而且,写儿童文学的时候,白冰会觉得很快乐。在部队期间,他也尝试写过反映军队生活的纪实文学、诗歌、小说,但总没有写作儿童文学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愉悦。“后来一想,可能自己适合写儿童文学。”其实,选择哪一种文体,肯定和作家内心深处的体征是相吻合的。80年代,白冰写的儿童小说、童话等频频获奖,以至于那时候很多朋友都管白冰叫“获奖专业户”。

因为喜欢儿童文学,白冰在作家出版社做成人图书的时候,就喜欢编一些儿童文学。比如,和台湾《民生报》的桂文亚女士合作、探索两岸共同出版模式的台湾儿童文学作家的童话集《银线星星》、秦文君的作品、杨红樱的作品等。因为自己喜欢写,也喜欢编辑儿童图书,所以白冰后来到了接力出版社,“想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和工作结合得更好吧”。

“浅语”的张力

白冰的作品向以诗意的语言和童趣的想象著称,这与他喜欢读诗、同时以写儿童诗出道有关。“诗的语言最精炼,对语言要求也比较高,所以后来写儿童文学,不管是小说还是童话,包括后来的幼儿文学,我喜欢在作品中追求一种诗的意境。”

观察可以发现,白冰早年写的儿童诗、少年小说和童话,体现出一种温情的暖意,但也有对生命和生活的淡淡的忧伤,而后期创作则转攻幼儿作品,一派坦率天真的童心盎然。

白冰承认,这与他的儿童观的变化有关。越到后来,他越希望呈现给孩子们一种快乐、阳光的东西,这与他在出版领域所倡导的“有趣有益”是相一致的,“只有益而无趣,孩子是不接受的”。当然,这也与作品读者对象的不同有关。

“早年,我写的《雁阵》、《梦的雕塑》,包括《洁白的茉莉花》,有很多生活中的另外一面,是悲剧,这是给年龄比较大的孩子阅读和感受的;但是给幼儿,首先还是要给他们爱和美的东西,展示正面的人格力量,因为他们的心灵还很稚嫩。随着心智的成长和情感世界的成熟,再让他们接触另外一些作品,他们就会觉得世界是五彩的,是两极的,既有温暖,又有寒冷,既有光明,也有黑暗,既有轻,也有重。”

然而,“诙谐”和“有情趣”,并不意味白冰对“诗意”的放弃。“在低幼童话中,我往往很注意语言的内在节奏和韵律,节奏和韵律是诗歌的一种特征,我把它融进童话写作中了。”

尝试过为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写作,白冰最大的感受是,读者对象年纪越小越难写。比如面向幼儿的作品,即使是亲子共读,要把语言做到孩子一听就能懂,也是很难的。“所以,在写作过程中,需要作家转变自己的生命状态,从幼儿的心态来体味和揣摩生活。”

对于语言,白冰非常赞同林良先生对于“幼儿文学是浅语艺术”这一观点。他的体会是,首先,所谓“浅语”,一是深浅的浅。这种“浅语艺术”是充满感情的语言,学者朱自强曾概括为“妈妈的语言”,充满着深情和爱。第二,没有生僻的字词,但是要求语言有艺术张力。因为要读给孩子听,要有色彩和声响,富于表现力。第三,没有复杂的中文语法,常用简洁的文字和口语化的短句。

其次,“浅语”又是“前语”。成人给孩子写作,要把自己对生命的体悟,对生活的体验,巧妙地毫无痕迹地融入作品,告诉孩子。再次,“浅语”还是“潜语”。语言、句子和单字可能很简单,但作品要有嚼头,耐人寻味,有艺术含量,把作家的诉求隐藏在形象和故事背后。

实际上,对幼儿文学而言,语言的魅力不仅是简单的字面意思的表达,一定要能够读出来,在发声朗诵的同时,体现汉语独有的韵律美和节奏美。“20多年前为我的儿童诗集作序的金波老师写童话和童诗的时候,他一定要读出来,边读边改。我也是这样,自己念几遍,边念边改,或者读给孩子听。”孩童时代的女儿是白冰的第一读者,女儿表情木然的地方他要删去,女儿哈哈直乐或凄然泪下的地方他要浓墨重彩。女儿长大后,白冰又找到了新的交流伙伴——把童话念给他的小妹妹的女儿听,经常要回答她一个接一个的“为什么”。

一边是创作,一边是出版

作为出版社的总编辑,事情很多很杂,压力也很大,白冰把儿童文学的创作视为生命状态的转换。“每一次进行儿童文学创作时,我都看作是对自己心灵的重新启迪,让自己变得纯净,通过创作体味童年。同时,在写作过程当中,会重新燃起儿童般的对这个世界的好奇,‘永远保持一颗惊奇之心’。”而这种“惊奇之心”又反哺了白冰的出版工作,在少儿出版界中,接力社向以善于创新而著称。

从写作当中,白冰还获得了更多,比如,对读者和作家的了解和理解。“要写作,就要读大量的作品,这种大量的阅读,会让自己对童书保持一种很鲜活的感觉。写作很快乐,也很痛苦,所谓痛苦,就是在写作过程中,会为斟酌一个节奏,一个韵律,耗费很多心血。这让我对编辑在编书过程中的语言要求很高;也对作家有了更多的理解,更珍惜作家的劳动和付出。”白冰说。

当然,唯一的问题是时间的稀缺。对于白冰而言,他的许多节假日是在写作中度过的。然而,给孩子写东西,给孩子出书,对白冰来说,是人生中两种重大的快乐,缺一不可。

对于孩子的世界,白冰也颇有自己的心得。比如,“在我们眼中,树是一种植物,但在孩子眼中,万物有灵,大树是妈妈,树叶就是她的孩子,树叶掉在地上,会想妈妈。”同时,在孩子眼中,变化就是乐趣。事物是变化无穷的,孩子正是在自己的变化和事物的变化之中,获取无穷的乐趣,这就是孩子的思维。

白冰认为,对儿童文学作家而言,保持孩子的思维,才能不断产生灵感。热爱万事万物,对万事万物充满敬意和感激,关心儿童现在的生活和生命状态,才能走进儿童的世界。喜欢亲近白冰的孩子们一眼就识破了他的“小秘密”——这个看起来一脸严肃的伯伯,其实心肠可软和了。一位朋友告诉我,今年去博洛尼亚书展时,在火车上,只是几个简单的眼神和手势的交流,一个两岁的意大利的男孩闹着要把自己最喜爱的布袋木偶送给白冰,让男孩的妈妈和同行的同事们很是“嫉妒”。现在,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,白冰做得最多的,是帮助寻找失踪儿童。

“一个作家在作品中追求的,实际是他梦想中的东西。我们要把我们的梦传达给孩子,给孩子梦想的翅膀,希望他们长大了之后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。”是的,那个从小就爱在作业本上涂抹“翅膀”和“小鸟”的白冰,早已把他的梦想化为字里行间的温情与爱意,小心翼翼地,弯腰递给小读者。

前水非后水,古今相续流——郭廷以和他的“史事日志”系列

■戴海斌

郭廷以(1904—1975)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驱人物,早年与罗家伦、蒋廷黻诸先生相过从,由垂手从教而至相与论学,交谊久长。自1928年起,已创拟《近代中国史》十九册的宏大写作计划,并有意与罗、蒋合撰近代史以供一般阅读。30年代以降,又陆续推出一系列“史事日志”类编年巨著。更为人知的是,他作为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首任所长,擘画创建,养成人才,使得一个新兴学术机构成长为近代史研究重镇,乃至卓然而立、孕育出享誉学界的“南港学派”。他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《近代中国史纲》在香港出版后,即受到学术界和读者重视与欢迎,先后3版13次印刷,继又在台湾刊行,目前在大陆也已有两个版本。今人论及郭氏史学贡献,常列举其多种以“史学日志”命名的著述。综计相关作品有《太平天国史事日志》二册、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》二册、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四册。此外《太平天国历法考订》、《郭嵩焘先生年谱》等书同属编年系事性质,也在所谓“年代学著作”范畴内。王尔敏归纳乃师史学功力所在,“基本上是春秋家正宗学养,研治史事,重视年代学”。(王尔敏:《郭廷以先生与中国近代史之学术建树》,《20世纪非主流史学与史家》,第14页)可以说,史志体裁的写作几乎贯穿郭廷以学术生涯始终,堪谓其史学著述中最具特色的一种。

郭廷以出生在河南舞阳一个小康的地主家庭,初小而高小,是最早一批新式学堂的试验者。1918年考入开封二中,后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中,1923年被保送入东南大学历史系。柳诒徵主讲中国文化史,因材料不好解决,鸦片战争以降一段几乎无从讲起,授课只好参考日文著述,并要求学生对照《东华录》比读。这实际成为郭廷以接触近代史料的初步。他说,“初看茫无头绪,后来越看越有兴趣,从道光朝看到咸丰朝,再往前看看到乾隆朝,我另编出一套章节,很得柳先生赞许”。约自大学二年级,郭开始做读书笔记,并渐将札记范围扩充至记录时事。北洋时期军事繁兴,郭据能接触到的资料,随时记录内阁变迁、各省军队番号、驻防区变更、军官出身等等,并列出表格,这些工作为“后来研究现代史的准备”,可见其已有保存当代史料的自觉。

在东大最初两年渐摸到研究门径,但真正引领郭廷以进入近代史研究天地的,还是罗家伦。他大三时,罗聘入东大历史系,郭回忆当时课堂情形:“由于罗先生名气大,讲话风趣,最初上课轰动一时,以风雨操场做教室,文科学生固然要听,其他科系学生也挤去听”。罗家伦犀利的谈锋、崭新的观念,给他极大震撼,由此结下学术之缘。1927年郭大学毕业,经罗家伦推荐,进入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工作。时值北伐,战争一发动后,郭就以史家的敏感意识到这是一件“大事”,据报刊逐日记“大事志”。他所在的政治部下属编史局,专门收集国民革命军史料,因此有条件写作“日志”,为将来撰写军史做预备。郭廷以有过史料学训练,在搜集资料方面非常用心,据他自述:“当时我收集资料的范围很广,标语也加以收藏,并记载了某年某月在某地某个机构贴出来的标语,由此可发现军政方面变化的迹象。”

不久后,郭廷以转入中央党务学校编译部,一面担任编译,一面纂写民国大事志,范围渐渐前推,“把清末至最近的近代史大事写出一个大概,对研究近代史有了一个骨架了”。至1928年春,完成《清季史事日志初稿》,由中央政治学校印行。当年郭应清华大学新任校长罗家伦之邀北上协助行政,并以历史系教员名义与罗合授“中国近代史”。1930年离开清华,相继执教于河南大学、中央政治学校,至1932年赴中央大学历史系任教,直至1949年。在中大郭廷以开设了近代史课程,并编写多部讲义,课余还常去各图书馆查阅资料。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,英文书多,地方志也有七八百种,这里成为他读书的“福地”。郭晚年忆及在图书馆狭小阁楼上查书的情形:“我把所有地方志都看过,善本书也全看过,相当下功夫,当时为了防蚊子叮,穿好衣服,但逢暑天温度一高,汗流浃背,非常之苦。”利用北京、南京等地资料,“近代中国史长编”得以不断充实内容,覆盖时段上自16世纪,下迄至民国20年代。他选出其中相对成熟的部分,以《太平天国历法考订》、《太平天国大事日志》独立成书。后者原名《太平天国大事日志》,据中大学生王聿均言,“改名可能是出于罗家伦先生的建议,史事日志是指与历史有密切关系的事件,而非一般事件”。两书出版后轰动一时,郭也由此奠立与简又文、罗尔纲鼎足而三的“太平天国史先驱大师”地位。

至迟不晚于1939年,《近代中国史事日志》写作已基本完成,但郭廷以精益求精,不愿匆忙定稿,加之抗战军兴,辗转耽搁,一直到60年代,即台湾近史所时期才正式出版。当时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也已初具规模,郭的多位弟子张朋园、吕实强、陆宝千、陈存恭等人对内容增补均有所贡献,而最终定稿是他晚年在纽约完成的。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,郭廷以仍旧保持着数十年前初操史觚时的工作热情,在美国各大图书馆搜集资料,逐日逐条加以增订,“到死还是没放弃”。该书出版经历了波折,张朋园后回忆说:“郭先生去世十年后,近史所才在所长吕实强的主持下,出版郭先生的《中华民国史事日志》。在此之前,我们几乎都认为郭先生这套书没希望出版了,因为那个时代,没有人敢批评政治,不像现在,就算你不喜欢总统也可以批评他,但在当时,你只有生闷气的份。”无论如何,多种史志终得以汇齐出版,总算是对郭先生身后的告慰。

今日流传最广的郭著《近代中国史纲》完成于上世纪70年代,而往前再推30年,郭廷以还出版过两大册以《近代中国史》为标题的著作。长(商务印书馆1940、1941年)这两册各达600多页的大书非一般意义上的近代通史,而是各以早期中外关系、鸦片战争为主题,按时序做“史料之整辑排比”的文献集,其性质不完全同于“史事日志”,但方法或内容均多近似。郭本人自承,在史学方面“比较影响我最大的是罗家伦先生,……影响我最大有二,其一是注意外国资料,其二是研究近代史。”1931年罗发表《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》一文,就“科学的近代史”研究宗旨、方法及范围提纲挈领,直言“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候”,“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,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”。此文作为“引论”收入《近代中国史》第一册,同书“例言”说:“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。以近代中国史论,现在尚为史料整理编订时期,而非史书写著时期”。史料取舍也严格按照罗所论以“原料”为尚,必不得已,始一用“副料”。

这类带有干燥的、实证气味的史学体裁,易造成一种刻板形象,让人以为郭廷以只是一个会写史事编年的“史匠”。其实撰写《近代中国史》时,除了排比史料,他还特别注意使分立不同的记载“互相联通”,各主题附以简要解说,以使读者获得“一贯明了之认识”。张朋园以今日眼光视两册《近代中国史》,认为其中“不只是史料,还有郭先生对史料的独特见解,并非没有解释”,并进而指出,解释历史的观念是由蒋廷黻所种下的。郭廷以在清华只待了短短两年,有一个重大收获,就是结识了蒋廷黻。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学术界充斥“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”的空气,各大学史学课程日趋专门化,而主持清华历史系的蒋廷黻却对此学术风气有自觉反拨,偏向为综合史学鸣锣开道。郭、蒋有过一同工作的经验,无论重实证的研究路数,或历史理解的宏观方面,皆多所共鸣。按郭的理解,“将史事按史时顺序排次,则全局悉入眼中,分条来看,容有支离破碎之感,综合参证,自有其脉络系统可寻”,理论上所谓待史料工作告一段落,再行深入研究,两者间并无截然分界。之所以视史事编年如此重要,在于他特强调历史连续性。郭常以李白诗句“前水非后水,古今相续流”作喻,将史实视为前水、后水,为一种不能中断的永恒连续,“历史研究首须认清史事,方能了解它的意义;史事须以史时来联贯,史时失去正确,史事即因而紊乱”。郭还重视中西“交通”的因素,认为历史不可分,不仅时间有连续性,空间亦有交互性,所谓“六合为一国,四海为一家”,此种现象“以近代为尤著”。

对编写史志的工作本身,郭廷以倒看得相当平易。他视史志为“一部近代中国的综合记录”,认为是一种“极平凡而相当繁琐的工作”,并归纳“有兴趣”、“肯耐烦”、“广涉猎”、“勤动笔”、“慎选择”数项标准,在实践中身体力行。郭常向学生灌输“勤动笔”的观念,“看到什么东西,觉得有意思,应该马上动笔把它记下来”,鼓励学生从档案中找专题进行研究,如果不是经过相当时期的史料训练,他是不放心让学生直接从事专题研究的。这一观念对近史所治学风格有着深刻影响。

李恩涵总结说:“当时凡是遵照量宇师指示,肯下功夫的,如李国祁、王树槐、王尔敏、张玉法等人就有很好的专书著作;没有照他的方法去做的,在近史所待了三、四十年也写不出一本好书的大有人在。”刘敬坤出自郭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所教的最后一班,也是他为数不多的留在大陆从事史学工作的学生之一。对于应在史料方面下的功夫,他在多年后有所反思:“很后悔没有照郭先生所说的去做,一直到后来我自己做研究,才发觉郭先生的路子是对的。”他承认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圈子里,郭廷以是一个“奠基者”,不过遗憾地表示:“目前在大陆,有几个人走郭廷以的学术路线,但却不是郭先生教的”。